

民族分层的研究视域 ——有关文献回溯和研究述评

陈 晶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民族分层是民族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综观中西方研究,从“民族”概念入手,多角度地理解民族分层的概念内涵,有助于拓展和明晰我国民族分层研究的视域。目前这一领域主要集中于民族分层的原因解释、对民族分层结构的宏观研究或经验分析,以及有关分化演变趋势的研究。研究者常用的操作化测量指标可以基本归纳为客观、主观及文化行为模式三种。然而,“民族”作为社会分层的视角或维度,仍面临许多挑战与思考。

关键词:民族分层;概念内涵;研究分野;测量指标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2)01-0016-06

“民族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①是多民族国家种族、民族关系等核心研究领域的重要专题之一。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中,调查分析社会分层结构中各种族、民族的相对地位及其变迁,是西方社会学家判定民族矛盾程度和预测民族关系发展前景的主要依据。然而,在我国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是否可以将“民族”作为同其他分层维度一样的分层变量,依旧是争论的焦点。为此,本文综合中西方的理论观点,对民族分层的概念内涵、研究分野及测量指标等进行梳理,并加以述评。

一、民族分层概念内涵的纵横解析

民族分层是民族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来说,社会分层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在社会地位上的分化与流动。“民族分层”就是在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中引进了“民族”的因素。首倡者美国学者格雷泽(Glazer)和莫尼汉(Moynihan)通过对美国社会各个民族间的“结构性差异”分析,研究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以探讨族群关系^[1]。我国学者郑杭生教授认为,民族分层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的以民族为基本分野的社会阶层划分的现象^[2]。而马戎教授进一步引进了

“结构性差异”来分析“社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反映了族群之间的不平等”^{[3]232}。由此可见,民族分层不同于社会分层,前者的分析单位是群体,而社会分层的分析单位是个人。从已有的定义来看,既然“民族”要素作为一个自变量发挥作用,那么对于民族分层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民族”内涵中去探求。而“民族”是什么?综合中西方学者在“民族”概念上的共识,其内涵应当包括:具“族类化”名称(符号);在体貌、语言、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历史记忆以及心理认同等具有共同特征;主要指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流群体,包括移民群体。这些特定要素是一种能够把个体聚集为一个群体的潜在力量。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即民族认同。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和追求(包括基本物质生存权益和精神方面价值、尊严等)^[4]。因此,民族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民族分层作为由各个民族群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等级阶层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两个视角来探析其内涵:一是基于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差别的横向视角,二是基于物质财产

收稿日期:2011-05-02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多民族杂居区社会分层与民族关系研究”(MUC98507-010505)。

作者简介:陈晶(1981-),女,甘肃省武威市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

E-mail: okokok_cj@hotmail.com

①有学者也作“族群分层”。笔者认为,汉语“民族”一词在综合中西方的理论实践研究上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参见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本文的“民族”主要指代多民族(ethnic group)国家内部的各民族(ethnic group)及移民群体。

和社会地位差别的纵向解析。

(一) 基于“民族性”区分的民族分层。

人类最初的社会分层出现与个人素质密切相关。伦斯基指出“在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中,权力、特权和声望多半是个人技艺和能力的一个函数。”^[5]“根基论者”的学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而民族成员就是由一种根基性联系凝聚在一起的群体^[6]。“一个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体系就是各个族群的次序等级体系,等级是由被认为享有共同的文化和身体特征的人们组成。”^{[7]36}无论是“根基性联系”还是“共同文化、体质”都是“民族性”的基本表征。因此,一些人认为,多民族社会的分层标准是民族性(ethnicity),民族在分层体系中是代表一种文化背景的维度出现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民族性首先是一种天赋的归属身份,民族成员的身份与生俱来,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在以人种定义民族的社会,肤色等身体差异越显著,群体界限就越清晰,即使是文化差异较小的群体,也是如此。身体差异通常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紧密相关。据调查,在以“熔炉”著称的美国,以同等罪行,非洲裔美国人被判入狱的机会是白人的 5.5 倍;而两者经济收入差别 2/3 可以归结为种族的因素;有近一半的仇视性犯罪都是针对黑人和犹太人的,近年来多见于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

其次,作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观念,民族性总是以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也有人把民族性视为“一种认同的形式,这种认同形式强调事实或虚拟的血缘关系以及历史上或现实的文化”^{[8]36}。格尔茨(Geertz)认为,身份认同主要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这种根基性的情感来自由亲属传承而得的“既定资赋”^{[8]37-38}。另外,一些没有明显种族差异的社会中,群体差异被人为地虚拟出来,比如印度种姓制度。“种姓”在古梵语中称“瓦尔纳”,意为“肤色”、“品质”,印地语叫“阇提”,意为“种”、“出生”。种姓制度使人一出生就划归了某一身份等级,从而对自身的处境形成认同,造成了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而这种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规范或社会准则遵从的程度差异是最直接的原因。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最本质的功能,获得了一种高度的权威力量来保护共同体的生存。同时,民族认同也在这种族属区分中得到强化。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沃特斯(Mary C. Waters)在其《族群选择》一书中表示,影响民族认同力量强弱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分层,即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对于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地

位低层的族裔来说,公开认同某一族群可能付出被歧视与非议的高昂代价,因此,难以改变的劣势地位或生理特征没有为他们提供自由选择民族认同的权力。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代价就源于民族分层和社会流动^[10]。尤其在劣势民族捍卫自身特权和力图改善自身状况时,各民族都把增强民族意识作为加强自身凝聚力和团结的手段,民族间的分层也在这种斗争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二) 作为资源交换过程的民族分层。

另一派被称为“工具论者”的学者将民族分层视为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民族分层的形成与变迁。当前,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造成了社会的分层体系,各民族因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而分列入不同的层级。

追根溯源,多民族社会一些内部结构不同的民族群体,基于自身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生产活动,并力图使这些活动合乎自身发展的目的。民族群体开始形成一定的共同体边界,以区别于其他群体。这种边界的最基本的意义和职能,就是确立了以人的个体发展代表整体发展的方式,开始对外执行资源产权的划分功能,对共同体外的其他成员实施资源共享的排斥。正如伦斯基所说“种族、民族(ethnic)、宗教或地域”是“在作为分配过程的一种资源而起作用的在某些属性方面占有共同地位的人们所组成的群体。一旦他们的成员资格对一个人在获得短缺供应的重大报酬上开始产生明显的影响,那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看成是阶级或地位群体了”^{[7]412}。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在共享同一个经济体系时,每个群体都会努力维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基于民族界限被建构了“竞争”,各群体对此所采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其核心就是资源控制。诺埃尔假设^{[7]47},当不同的群体争夺资源时,他们的关系就会呈现竞争和冲突,这种关系越紧张,出现分层的机会就越大。有人提出:“资源交换可以认为是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的动态层面”,在原则上,“族群(ethnic group)群体的地位依赖于他们和其他族群(ethnic group)交换资源的数量和类型”^[10]。因此,格雷泽和莫尼汉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民族(ethnic group)是作为一种利益群体而根据利益来加以定义的,今天的民族如同其他由利益所构成的群体一样在进行有效地利益追求,而且事实上他们的追求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加有效。”^{[3]231}许多实例证明,把利益与更为广泛的文化和情感纽带连结起来,使得群体更容易达成利益目标和争取到权利。

从以上两种阐述也可略见中西方对民族分层内理解和运用的不同倾向。但我们知道,这些不过是基于分类的理想类型而已。事实上并没有哪个社会的民族分层源自于纯粹的“根基性”联系,也不会完全建构于“工具论”的真空中。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加速,社会经济一体化正在使群体间先天性差异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小,对群体的各种类型特征区分将可能丧失其重要性和显著性。随着个体之间的交往加深和文化上的相互吸收、渗透,不同民族不断地拥有他者的内涵,民族身份和特征使得谋求个体利益的企图越来越隐蔽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分化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对民族分层的理解需要审慎思考。

二、民族分层的研究分野

在全球化视野中,民族分层已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相关研究议题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中都可以略窥一斑。从近年的研究就可以认识到这一课题的前景和挑战。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民族分层的原因探讨。

首先 权力分析视角。它认为,民族分层归根结底就是权力控制下的资源博弈,特定的族群分层状况与其相应的社会公共权力瓜分格局具有重大关系,各阶层之间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和占有都在于与权力阶层的关系。“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就是强调在各民族对抗过程中某种经济竞争发挥的作用^{[11]482}。其次,文化差异视角。民族之间在体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会带来彼此在心理上的距离感,使人们把其他民族成员看作“异类”,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其他民族进行了“社会距离排序”。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情结”可能使其境内的阿拉伯人永远处于从属地位,永无翻身之日。再次,社会形态边缘化视角。少数群体由于远离核心地区,在现代性方面自然与主体民族存在无法比拟的不利条件,难于转换观念意识;其本身所携带的一些与现代性相距甚远的传统习惯和观念长期得不到现代性启示,使得传统社会形态一直以“不合法”的身份,继续扮演“合法”的主流角色,其贫困和落后将不可避免。最后,群体差异性取向的角度。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立性,使得两者在不同领域中形成了群体区隔,在这一客观生成的差距面前,一些学者或社会舆论不自觉地倾向于忽视少数民族差异的取向。从全球化视角出发,他们眼中的少数民族、原住民、种族和移民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存在,其角色功能没有给予太多的期待。

(二) 当代民族分层结构分析。

一般来说,按照研究对象地理空间范畴,民族分层被划分为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民族聚居杂居地区的民族分层及单一民族内部的分层^{[2]89}。在向现代和后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当代民族分层的最主要的分界线或区隔的变化发展是近来研究关注的焦点。

首先,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群体间的分层研究。西方世界向我们展示了发达移民国家的美国、移民共生型国家马来西亚以及民族间高度隔离的印度、以色列等国家内部的分层。在我国,马戎教授从教育、产业、职业和城市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全国各民族的结构性差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之外,还存在一个由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群”公民之间的制度化区隔形成的“二元结构”^[12]。此外,大量城市外来务工者并未融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其中就包括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分层变得更为复杂,引发了社会交往中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次,多民族聚居杂居社区或城市多民族社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结构性差异的研究。梅瑟和丹顿(Douglas S. Massey, Nancy A. Denton)通过对美国社会黑人社区的研究提出,在美国社会最初的种族隔离中,居住隔离是导致城市贫困和下层阶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3]。前不久,美国萨缪尔·梅尔斯(Samuel L. Myers)教授和我国丁赛教授通过对中国12个省的城镇居民少数民族与汉族间“收入不平等的跨期变化”研究发现,城镇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收入差距很小,可能归功于少数民族多数在公共部门就业;少数民族女性与汉族女性的收入差距总体呈现缩小趋势,并且逐渐表现出高于汉族女性的现象,而男性的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14]。我国学者起初在民族关系研究中发现了各民族在教育、职业、收入方面存在的差异,后来逐渐形成了从行业、职业、教育、城市化等指标考察结构性差异的方式^①。

① 参见杨圣敏《新疆的民族关系》载《西部开发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国家民委内部报告)2002年版;李建新、蒋丽蕴《新疆维汉关系研究:吐鲁番艾丁湖乡调查》,《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静、王丽娟:《新疆各族群间的结构性差异现状分析》,《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6期;梁茂春《广西各民族间的结构性差异》,《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敏俊卿《甘南地区族群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马东平《甘肃族群社会分层现状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再次,单一民族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化研究。在西方,主要是移民飞地研究,主题集中在移民文化变迁、“二代”移民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困境及同化,以及应对歧视和排斥的心里紧张和文化适应过程等问题^[11]⁴⁹⁵。如美国对曼哈顿的犹太人、西海岸的日本人的研究以及特立尼达印度人的飞地型移民文化研究等。我国1990年以前,在少数民族内部,传统的阶层分布格局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正如伦斯基所说“在大多数正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农业社会里,部落式的社会组织形式直到现在都还存在。部落成员资格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的人口当中的一些部分所占据的(社会)地位,其权利、特权和声望是建立在旧的社会秩序中的资源的基础之上。”^[5]基本上是对某一民族在历史传统阶级意识作用下的阶级分化特征、个体在阶层间的流动条件和状态以及各阶层间关系的研究。在彝族、侗族、佤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地区都有过类似的实证研究^①。

前些年的研究表明,各民族地区迥异的文化特征对少数民族内部的阶层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而近年来,在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逐步多元化,单一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形成了一种层次性的多元化利益群体结构。一些研究关注了少数民族在组织结构、文化教育、宗教结构、婚姻家庭等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重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②。尤其是旅游观光产业的开发直接带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当地民众的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层。

(三) 民族分层的演变。

民族分层与社会分层一样存在分化与流动。尽管在我国民族地区尤其是多民族地区,除了“民族性”差别之外,在一些客观因素,如性别差异、宗教信仰差别、地理环境差别、城乡分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差异等影响下,民族分层基本上表现出相对稳定的阶层化现象,且阶层关系较为融洽;但同时,由于各民族在语言使用上的共通与排斥、居住格局的接近与隔离、社会交往的频繁与疏离、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与差异以及民族意识的淡化与增强等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演进与组合,民族分层格局近年来呈现出新旧阶层不稳定、阶层分布和发展不平衡、阶层间流动频繁、阶层间冲突时而有之的状态和趋势。那么,在目前的民族政策下,不同民族在各个方面的“区隔”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围绕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有研究证实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普及

后,民族不平等却又转向了高中教育和大学等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的分层,研究者正是通过分析民族地位属性对教育获得状况的影响及其过程,试图折射出民族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15]。

三、民族分层的操作化指标

民族分层研究借用了社会分层研究的维度和指标,在多民族社会的不同民族差异和相互区别的前提下展开讨论。民族分层不单是一种社会事实,还是一种与民族心理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综观中外学者的研究,根据不同视角粗略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 客观指标。

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例如,美国社会学家一般把民族群体作为社会结构分析单位,从产业、城市化程度、教育、就业、职业、收入、医疗、犯罪率、住房、政治参与等多方面考察美国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我国学者经常引以借鉴,将某地域的不同民族就以上各方面进行比较,以发现不同民族在各指标上的显著差异。而对单一民族,不少研究分别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生产资料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权力的分化或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对民族社会进行阶层化探讨^[16]。

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资源不同会导致阶层地位的差别。尽管属于“自获地位”,但仍是客观的。如沃纳(W. Lloyd Warner)等人在《美国社会阶级》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于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国内研究也表明,在一些民族地方,各民族在公共生活领域内交往频繁,而私人领域交往有限,特别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体,民族界限清晰而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③。

① 参见刘正发《浅谈凉山彝族社会分层结构》,《西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廖君湘《侗族传统社会分层的特殊结构及其成因》,《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李臣玲、贾伟《多维民族文化交汇地带的社会分层研究——以丹噶尔藏人为个案》,《民族论坛》2008年第6期。

② 参见黄晓峰《甘肃民族分层状况与稳定研究》,《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赵春晖《现代撒拉族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马夫《固原市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特征及其对贫富分化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③ 参见阿依努尔《新疆维哈民族关系研究:以克拉玛依市为个案》,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晓霞:《新疆阿图什市民族交往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二) 主观指标。

传统声望。传统社会分层因社会声望不同而形成分层群体,即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或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有学者认为,主观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是第一位的,经济地位是第二位^[17]。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特别是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权威通常决定各阶层的地位。比如彝族的纠纷调解人“德古”是氏族最有威望的公正代言人,彝族社会的控制只要通过“德古”出面就可自行了结,“历来的习俗把一切调整好了”^[18],恩格斯曾称这种现象是“一种美妙的制度”^[19]。

阶层认同。近年的研究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的身份认同或文化价值观,而不是他人评价。就是说,社会成员根据某项标准对自己的阶层归属作出主观认定,把自己归属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某一层,进行主观评价^[20]。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层级婚”现象就是以身份认同、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作为选择婚姻归属的依据^[21]。

(三) 文化行为模式指标。

民族个体在客观资源上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与其阶层认同相结合所形成的实践感,决定着他们的生活实践行为选择。随着消费文化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消费实践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地位特征的重要外显指数。我国少数民族多分布于偏远乡村,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主要表现在宗教和婚丧礼仪等方面。信仰同一宗教的不同民族中,哪一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消耗较多时间、精力、金钱等,这一民族越享有较高声望地位。此外,居住模式、交往模式、生活方式等亦被证明是分析阶层结构及阶层形成的客观维度。例如美国的华人餐饮业,由于许多美国人愿意在中餐馆就餐,因此,华人的居住范围便随着中餐馆散布在全美各地而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角色。而那些据守在“保留地”的美国印第安人则长期停滞在传统的发展水平^[22]。

综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选取多个维度和指标进行综合比较,更有利于客观、全面地评价各民族的分层及结构性差异状况。中西方对民族群体差异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着各自的倾向,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测量指标的选择与设定,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我国民族分层研究中,常常会出现同一民族在不同指标上的地位分布不一致的现象,对此,判定是否属于民族分层现象,以及指标选取的具体依据和一致性考虑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四、民族分层再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发展呈现出交融渗透和共同繁荣的趋势,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也在不断增多,但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仍客观存在。有学者从冲突视角认为,中国民族社会不存在事实上的“民族分层”而只有“民族内部分层”^[23]。实际上,民族不平等强调的是民族间的净差别,即控制地区、阶层等因素之后民族间的差异,而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于民族差异研究,较少深入到民族不平等的分析,而且对这两种差别也缺乏清晰的区分和探讨。对于“民族”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长期处于某种缺席失语的状态,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切合实际的思考。

(一) “民族”作为一种分层维度?

首先,民族不同于政治、经济、声望等分层维度,却与其有紧密的联系。如前所述,几乎在所有的多民族社会,人们的民族分类是决定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简言之,人们得到有价值的资源如工作、教育、财富等的总量不同,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在整体分配体系中,民族分层与其他形式的分层内在联动。如人类学家所论证“经济活动中,环境的关键是资源,人们通过文化认识资源,并以由历史所衍生的技术获取资源。因此,一定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资源的变动关系,而且必然受到民族现存的、并不断演变着的特定文化价值标准的制约。”^[24]

其次,民族分层体系和其他分层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平行的,民族内部成员并非随机散布于整个经济和政治阶级体系中,而是趋于簇集在某些特定的层级^[25]。但是少数群体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被自动地与某一阶层的财富、职业、教育、政治等方面的等级地位联系起来。因此,不应该期望一个特定民族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个经济和政治阶层,或者具有同样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与态度。

总之,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区分不同群体,这些群体又常常是互相交叉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标准都有其目的或价值取向的。在市场转型和社会巨变最为重要的时期,探索区分民族阶层地位差别的标准和方法,其目的是要寻找缓和民族社会矛盾、协调民族社会关系、维护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引入“民族”标准,要看它是否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二) 如何对待西方理论?

我们常常被动地面对国外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成果,引起颇多争论。为此,要结合国情,

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外研究的理论方法。当前的民族分层的理论阐述主要借鉴了来自西方或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研究,西方的种族和民族分层研究主要是在移民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当不同人种、族群的人相遇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同化和冲突进程。由于一个分层社会中各种资源和机会是有限且有等级的,争夺资源和机会既可能沿着等级阶层的维度展开,也可能沿着民族的维度展开。因此,西方理论对我们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开展初始性的研究。而我国多民族社会“多元一体”格局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将其用于分析我国的民族分层时,则必须考虑适用性问题,不能生搬硬套,削足适履。

(三) 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马戎. 美国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 1997(1).
- [2] 郑杭生. 民族社会学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12, 89.
- [3] 马戎. 民族社会学: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31 - 232.
- [4] 王希恩. 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 1995(6).
- [5] 格尔哈斯·伦斯基.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116.
- [6] 马忠才. 族群认同的力量: 读沃特斯《族群选择》[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7).
- [7] 马丁·N. 麦格·祖力亚提. 族群社会学(第6版)[M]. 司马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36, 41, 47.
- [8]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 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 [9] Mary C. Waters. Ethnic Option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22.
- [10] 陈庆德. 资源博弈过程中的族群性要素[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0(1).
- [11] 戴维·格伦斯基. 社会分层[M]. 王俊,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12] 马戎. 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 北京大学学报, 2010(3).
- [13] D. S. 梅塞, N. A. 丹顿. 美国式的种族隔离: 种族区隔与下层阶级的形成[M]//戴维·格伦斯基. 社会分层. 王俊,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578 - 586.
- [14] S. L. 梅尔斯, 丁赛. 中国城镇地区民族间收入不平等的跨期变化[J].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 2010(19).
- [15] 洪岩璧.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读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J]. 社会, 2010(2).
- [16] 陈顺强. 探析新时期凉山彝族社会分层现状及特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8).
- [17] T. Parson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4: 83.
- [18] 曲木伍各. “德古”: 彝族民间的纠纷解决人[J]. 西昌学院学报, 2007(9).
- [19] 恩格斯. 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99.
- [20] 郑晨. 阶层归属意识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广州市居民的一项调查[J]. 浙江学刊, 2001(3).
- [21] 曹端波.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群的社会分层与层级婚[J]. 思想战线, 2008(5).
- [22] 马戎. 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 区域差异、职业差异、族群差异[J]. 北京大学学报, 2009(1). 刘精明, 李路路. 阶层化: 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5(3).
- [23] 陈怀川. 中国民族社会结构“民族分层”抑或“民族内部分层”[J]. 广西民族研究, 2010(1).
- [24] 陈庆德. 经济人类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482.
- [25] 马戎.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4(3).

(责任编辑 李吉和)